

蘇聯對亞洲的政策

畢英賢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的十數年間，蘇聯國力較弱，因此除了在歐洲大力經營外，在其他地區尚無力追求任何遠程的對外政策目標。在亞洲，蘇聯當時的主要目標乃是削弱或消除美國在中國、韓國及日本的力量。一九四九年中共偽政權的成立，使蘇聯向其目標邁進了一大步。一九五〇至一九五三年，美國大力協助南韓抵抗北韓的擴張，阻遏了蘇聯在亞洲的進一步發展。韓戰之後，蘇聯對日本不存奢望，開始了緩慢的關係正常化過程。同時，美國在日本與南韓的駐軍也因此堅守不去。蘇聯要想把美國勢力從其亞洲邊緣地帶驅走，已更加困難。

一九六〇年代中期，匪蘇衝突升級，予蘇聯的亞洲政策以極大的衝擊，此時雖然美國在中南半島的介入劇增，而蘇聯的亞洲政策中反中共的成份逐漸超過反美成份。易言之，「圍堵中共」^①已經是蘇聯亞洲政策的主要目標之一。蘇聯一方面在中蘇邊境增加駐軍，另一方面利用「亞洲集體安全體系」名義，企圖在亞洲廣結與國，形成集團，對中共進行政治上的圍堵，同時也就在亞洲伸張它的勢力。

蘇共總書記布里茲涅夫在一九七五年蘇共第二十五次代表大會的總結報告中曾說，「在過去五年中，中央委員會極為注意與亞洲各國發展正常的，而且儘可能是友好的關係」；他又說，今後將「在亞洲各國共同努力的基礎上，進行保障亞洲安全的大業」^②。這些話標誌了蘇聯對亞洲政策的兩個方向：與個別國家改善關係；為建立「亞洲集體安全體系」不斷努力。本文將就這兩個方面，檢討蘇聯的亞洲政策及其執行成效。

蘇聯亞洲政策的目標

蘇聯亞洲政策目標顯然在：抵制中共勢力的擴張，逐漸削弱美國在亞洲的地位，最後建立蘇聯在亞洲的超級強國地位。為了達到這些目的，蘇共曾倡議而且仍在圖謀建立「亞洲集體安全體系」。因此，蘇共的「亞安體系」的構想不僅是反中共，反美，而且含有遠程目標。莫斯科提出「亞安體系」之時，也就是蘇聯在亞洲試圖建立霸權之始。

註① 赫 (Joseph M. Ha)，「莫斯科的對日政策」，「共產主義問題」(Problems of Communism)，一九七七年九、十月號，第六十一頁。

註② 「消息報」(俄)，一九七六年二月二十三日，第三、四頁。

匪蘇衝突並不是蘇聯更張亞洲政策的唯一因素。國際均勢的劇變，也是促使蘇聯重新評估與釐定在亞洲政策的重要原因。在此軍事兩極與政治多極的世界中，克里姆林宮的決策者對國際均勢的發展密切注視。他們認為，「世界力量的對比」正在演變，這種演變有利於「社會主義」；甚至有些俄國人認為，在目前的國際均勢中，蘇聯已佔優勢^③。根據蘇聯的資料，這種全球性的均勢的轉變，大概發生在一九六九年。當時，布里茲涅夫宣稱，蘇聯所領導的「社會主義大家庭」，已緊緊掌握了歷史的主動權，國際均勢已發生了對帝國主義不利的轉變^④。事實上，在一九六九年前後，蘇聯在核子武力方面與美國已相距無幾，在傳統的軍事力量上亦已壯大，因此俄人所云，並非全是恫嚇之言。就在一九六九年，匪蘇兩度發生較大規模的邊界衝突；同一年，布里茲涅夫首次提出了「亞洲集體安全體系」的構想。

按照布里茲涅夫自己的解釋，蘇聯主張「亞安體系」的動機，是要在亞洲消除戰爭、軍事衝突及「帝國主義」侵略，保證每一國家與人民有自由發展與民族復興的條件，使亞洲各國關係間充滿信任與互助精神^⑤。蘇共也一再聲明，「亞安體系」將包括所有的亞洲國家，在這個體系中沒有任何國家可犧牲其他國家利益而享有特權，各國平等相處，整個體系不與任何個別亞洲國家或國家集團為敵。蘇聯雖然是「亞洲集體安全的保護者」，但「不為自己尋求任何特權」^⑥。蘇共認為，獲得亞洲安全最有效的途徑之一，是各國在和平與睦鄰關係原則的基礎上，簽訂雙邊與多邊條約。這些原則包括：在國際關係中不使用武力；尊重主權與疆界不可侵犯性；不干涉內政；在完全平等與互利的基礎上廣泛發展經濟及其他方面的合作；承認並遵守各國人民支配自我命運的權利；不容許藉侵略手段吞併領土；以和平方式解決一切國際爭端；尊重各國人民獨立掌握其天然資源與實行社會經濟改革的不可剝奪的權利^⑦。這些原則看來冠冕堂皇，但至少有三點值得注意。在實踐上，蘇共善於利用條文作利其自身的運用。例如，「疆界不可侵犯性」可使蘇聯已掠奪到的領土固定下來與合法化；事實上，這也是蘇聯竭力召開歐洲安全會議的主要目的之一。其次，蘇聯履行條約或協議等的誠意始終令人懷疑。蘇共政權標榜這類外交原則由來已久，但其對外行為則往往背道而馳。例如，一九六八年蘇聯糾合其他共產國家的軍隊對另一個共產國家（捷克）進行武裝干涉之時，蘇共並未顧慮「不使用武力」、「尊重主權」、「不干涉內

註③ 這種觀點經常出現在蘇聯領袖或評論員的言論中，例：沙納科耶夫（*Sh. Sanakoyev*），「今日世界：力量對比問題」，載「國際生活」，一九七四年，十一月號，第四〇—五〇頁；提摩費耶夫（*T. Timofeyev*），「無產階級革命鬥爭的旗子」，載「共產黨人」，一九七五年四月號，第九八—一〇八頁；科瓦林柯（*I. Kovalenko*），「爭取亞洲和平與集體安全鬥爭中的蘇聯」（莫斯科：「科學」出版社，一九七六），第二六四頁。

註④ 阿斯塔費耶夫及杜賓斯基（*G. Astafyev; A. Dubinsky*）編，「從反帝國主義到反蘇主義：北京對外政策的演變」（莫斯科：進步出版社，一九七四），第六十七頁，奧弗錫昂涅（*I. Ovsyany*）等，「蘇聯對外政策研究」（莫斯科：進步出版社，一九七五），第十八頁。

註⑤ 布里茲涅夫，「論蘇共與蘇聯之對外政策」（莫斯科：政治出版社，一九七五），第五六四頁。

註⑥ 此類論調經常在蘇共言論中出現，例：烏特金（*E. Utkin*），「保障亞洲安全之路」：載「國際生活」，一九七七年四月號，第九十一—九十三頁。
註⑦ 科瓦林柯，「爭取亞洲和平與集體安全鬥爭中的蘇聯」，第一八九頁。

政」等原則。在東歐集團內，蘇聯也很少遵守「平等」、「互利」、「自我支配命運」等原則。因此，對蘇聯所提出的「亞安體系」，不能就其票面價值予以評估。

所以，許多觀察家仍相信，布里茲涅夫的「亞安體系」構想，是匪蘇邊界衝突的結果，其主要目的在於組織反中共陣線，但是，其他隱伏的目標，亦不應予以忽視，當蘇共宣佈「亞安體系」建議時，美國尼克森政府已表明撤離越南與東南亞的意向，英國亦表示在一九七一年前將其部隊從蘇彝士運河以東撤回。這一情勢觸發了軍事力量日益壯大的蘇聯填補這一地區權力真空的野心。因此，蘇聯欲以其所提出的亞洲集體安全概念為有憑藉，俾能接替西方在亞洲的地位，並防止日本「帝國主義」的重現^⑧。其後，匪美接近，匪日建交，使這個構想更具意義；蘇聯可利用這個概念防止「匪、美、日反蘇聯盟」的形成。就戰略意義言，亞洲集體安全構想含有下列區域性目標：防止對蘇聯現有領土完整的威脅，增加蘇聯區域性力量與影響力並相對削弱美國與抵制中共勢力；維持蘇共意識形態的優越地位，使其凌駕於中共及其他亞洲共產政權之上；迫使中共依蘇聯的條件達成和解；減輕匪美「正常化」的影響；改善對日關係並防止匪日聯盟。

從莫斯科亞洲安全概念中，也可以引伸出蘇聯在亞洲政策中的兩個優先目標。第一是「反中共的圍堵政策」。匪蘇關係的惡化原是此一政策的基本因素之一。毛澤東死後，匪蘇和解希望未見增加，因此蘇聯的安全設計仍有必要。為了達到圍堵中共的目的，必須在亞洲防止任何反蘇集體力量的形成。以往，蘇聯對外政策係以歐洲及軍備競賽為優先；如今，亞洲安全顧慮的重要性已不在前兩者之下，匪、美、日聯合的可能，迫使莫斯科注意日益重要的東亞地區。

蘇聯在亞洲的第二個優先目標是反美。蘇聯意圖擴張其在亞洲的勢力，逐漸削弱美國的力量，進而填補美國在某些地區可能遺下的權力真空。克里姆林宮始終反對亞洲國家在美國領導下，形成反共組織。從蘇共最近言論看，蘇共正利用亞洲安全設計作為追求下列目的的工具：取代業已瓦解的東南亞公約組織；抵制東南亞國家協會；抵制美國的「太平洋主義」與日本的「福田主義」。如果，蘇聯一旦在前述諸目標上獲得相當程度的成就，則它在亞洲的霸權地位之爭，就取得了初步勝利，但事實上，近年來蘇聯在亞洲活動的成效，並不顯著。

蘇聯與中共

過去十多年內，蘇聯雖然經常表示，願與中共「在和平共存原則上」進行關係正常化^⑨，但是在蘇聯對中共的政策中，隱含着

註⑧ 賀立克(A. Horlick)，「蘇聯亞洲集體安全的建議：正在尋找會員的俱樂部」，載「太平洋事務」，一九七四年秋季號，第二七〇頁。

註⑨ 布里茲涅夫，「總結報告」，載「消息報」，一九七六年二月二十二日。

威脅與動武的傾向。因此，中共說：「蘇修亡我之心不死」^⑩。另一方面，蘇共領導覺得，如果中共繼續反蘇，則早晚會威脅蘇聯的安全，尤其是中共軍事力量壯大與區域影響力增強之後。所以，蘇共領導不斷設法包圍中共，攻擊北平頭目，勸阻其他國家不與中共結盟。爲了對付中共，蘇聯從一九六五年起在中蘇邊界及其附近不斷增加駐軍，增強武力，以致中共難與匹敵；雖然中共在中蘇邊界附近的兵力佔數量上的優勢，但正規部隊却比不上蘇聯。

中共領導對蘇聯的圍堵政策，深具戒心，同時也加強了反包圍的努力，設法把蘇聯的力量引向別處，並利用蘇聯其他方面的不穩定情勢，進行反擊。赫爾辛基歐洲安全與合作會議，使歐洲緊張情勢緩和，但遭到中共嚴厲的攻擊；因爲歐洲緊張的緩和不利於中共的安全。中共並且說，「世界局勢並沒有緩和，戰爭因素在明顯增長」，「歐洲由於其政治、經濟和戰略上的重要性，是兩霸爭奪的戰略重點」^⑪。華國鋒也在「中共十一大」上說，「蘇美爭奪遍及世界各個角落，但爭奪重點仍在歐洲」^⑫。其實，這種論調在蘇美和解之初即已出現，其用意無非勸說西方勿輕易放鬆西歐的防務以免蘇聯將更多兵力東調。

蘇聯自然不願與中共長久對峙下去，因此它對中共的政策有兩個主要選擇：一是和解；二是強制措施。

爲蘇聯長遠利益計，達成和解，或至少降低雙方關係中緊張的程度，乃是當今蘇共領導所願意採取的政策。這種意願經常出現在蘇共的聲明與報刊文章中。蘇共總書記也一再表示，願與中共，像對其他國家一樣，以「恪守平等、尊重主權與領土完整、不干涉彼此內政、不使用武力」等原則爲基礎，改善關係。然而，由於蘇聯已使沿中蘇邊界地區的軍事地理作了恆久性的變更，使匪蘇關係急劇改善的可能性大爲降低；即使未來某一方的領導更換或對國家利益重新評估，而欲進行和解時，其和解範圍也受到了限制。即使匪蘇雙方暫時不談無法解決的中蘇領土爭執與意識形態之爭，并同意從中蘇邊境撤走部分軍隊或減少各地駐軍，雙方業已建立的相互對峙的軍事設施，仍將使雙方難以脫離對抗形勢。所以最近鄧小平說，中共「與蘇聯的再次接近是不可想像的」，「我甚至不排除下一代也看不到這種狀況的可能性」^⑬。

蘇聯在中蘇邊境增加駐軍，名義上是對付中共的威脅，實際上另有作用。蘇聯陳重兵於界上，旨在等待中共內亂，乘時而入，或推翻現有政府成立親蘇政府，或迫使現有政權屈從蘇共。在蘇共的估計中，中共於毛澤東死後的權力轉移鬥爭，可能會給予蘇聯良機。莫斯科在匪蘇爭執中，始終不放鬆意識型態立場，始終堅持「社會主義國際主義」，也就是爲蘇聯保留一個對中共進行強制措施的藉口。蘇聯「亞洲集體安全體系」的主要目標之一就是企圖與中共周圍的國家結成雙邊或多邊的安全聯盟，以孤立中共，俾

註⑩ 「社論：向國防科技現代化進軍」，載「解放軍報」，一九七七年九月二十四日。

註⑪ 黃華在聯大發言全文，「大公報」（香港），一九七七年十月一日，第三頁。

註⑫ 華國鋒，「在中共第十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大公報」（香港），一九七七年八月二十三日，第三頁。

註⑬ 「鄧小平同韋爾納談莫斯科的弱點」，原載西德「世界」報，一九七七年九月二十六日；譯載「大公報」（香港），九月三十日。

便遂行蘇共對中共的強制政策。

蘇聯與日本

在蘇聯的亞洲政策中，日本佔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在「亞安體系」中，日本的動向極具影響作用。在美國一九七三年所宣佈的「太平洋主義」中，日本是美國執行亞太地區政策的主要盟邦與支柱。因此，在美蘇與匪蘇關係中，日本扮演一個特殊的角色。

一九五六年十月，日蘇恢復邦交，曾留下一項懸案，那是有關和平條約的締結。如果說，印蘇友好條約是蘇聯近年來對亞洲外交的重大成就，那麼久久未能簽訂日蘇和平條約乃是最大的外交失敗。蘇聯表示，它極重視對日本關係的發展，並為此竭盡所能。布里茲涅夫正式宣稱：「在蘇日關係中，只有睦鄰與友好合作才是應有的法則」；同時他警告日本「不要同走上那些想從蘇日關係中獲取漁利者所要它走上的那條路」^⑭。蘇共所指，顯然是中共與美國。

現階段中，蘇聯對日本政策的重心在：(一)防止匪日反蘇聯盟的形成；(二)削弱美國在日本的勢力；(三)經濟合作。

一九五六年「蘇日共同聲明」^⑮結束了雙方的戰爭狀態，恢復了兩國外交關係；雙方原期望在最短期間內舉行談判簽訂和約。一九六〇年的日美「協作與安全保障條約」觸怒了蘇共領導，使蘇日關係難以進一步獲得改善。六十年代中期，蘇聯在亞洲的主要鬥爭對象由美國轉變為中共，使蘇日關係有了轉機的先決條件。

一九六九年匪蘇關係惡化達於極點，接着匪美關係的急劇轉變，日本對「尼克森震撼」所產生的憤怒、匪日關係的正常化、中共竭力破壞蘇日關係，凡此皆促使蘇共重新檢討對日關係。一九七二年，蘇聯外長訪問日本，在領土問題上不堅持原先立場，容許日本獲得西伯利亞資源，應允擴展西伯利亞市場，口頭上支持日本反對中共，願與日本就東亞政治問題進行合作。同時，蘇外長要求日本保證不同中共發展有損蘇聯利益的關係^⑯。蘇外長的訪日，雖然沒有多大政治效果^⑰，但可視為蘇日關係的分水嶺，因為在此以前蘇日間是一個互相漠視的關係，在此以後的蘇日關係則包含合作與衝突。其後，由於蘇聯國際地位漸強，對日本的興趣也逐漸降低而不急於展開和約談判。但是，雙方經濟關係尚有進展。蘇日政治關係發展中的兩個主要阻礙是，西伯利亞投資條件問題與歸還北方領土問題。一九七三年十月，日本首相訪蘇時，一名蘇共官員表示，亞洲安全是首要問題，領土問題是小問題，如果亞洲

註⑭ 同註⑨，第三頁。

註⑮ 「新時代」週刊（俄），一九五六年十月二十五日。

註⑯ 「朝日新聞」（東京），一九七二年元月二十五日。

註⑰ 見「蘇日聯合公報」，載「消息報」（俄），一九七二年元月二十九日。

和平共存結構能够建立，則領土問題可獲解決^⑩。易言之，如果日本支持蘇聯的「亞安體系」，則蘇聯可在領土問題上讓步。此後，由於匪日反蘇聯盟的可能性減少，蘇共對蘇日和約談判的興趣就顯得冷淡。

一九七五年底，日首相三木武夫表示，如果擬議中的匪日和約中的「反霸條款」的文字可為雙方接受，則日本願簽和約。次年，蘇外長匆匆抵東京並向日本提議，如果日本保證不在有「反霸權」條款的條約上簽字，則蘇聯將歸還北方四島嶼中的兩個。日本非常氣憤而未理會蘇外長所提建議。這樣一來，日本介入了匪蘇爭執之中。

自從美日第一個安保條約（一九五一年）起，蘇聯即企圖設法使其廢除，其所提議的「亞洲集體安全體系」主張結束一切現存區域性安全關係，清楚地表明蘇聯意圖永久廢止美日安保條約^⑪。近年來，蘇聯太平洋艦隊力量增加，活動頻繁，顯然不是以針對中共為主，因為匪蘇一旦發生戰爭，將以大陸為戰場，海軍至多只能發生騷擾作用；所以其主要目的乃是美國和日本。

蘇聯對日政策雖然以政治與戰略目標為主，但在另一方面，又以經濟作為促進雙方關係的基礎。經濟合作本身固然對蘇聯有利，但蘇聯領袖只是利用經濟手段以追求其政治戰略目標：（一）加速開發蘇聯西伯利亞與遠東地區；（二）為蘇日久遠合作奠定基礎；（三）使日本在大國間維持等距外交原則。

按目前情勢看，蘇聯無意在蘇日關係中尋求突破，不企圖與日本建立短期聯盟，而願意日本同各主要國家等距相處。一個比較獨立的日本，可能使蘇日關係有較大的改善機會，可能促進蘇日經濟合作，有助於蘇聯建造其在東亞的優勢地位。另一方面，日本軍事力量的日益強大，又使蘇共擔心不已。

蘇聯與東南亞及南亞

蘇聯所標榜的對東南亞政策是：支持該地區各民族各國家為消除該地區內外國軍事基地與撤走外國軍隊，為鞏固其民族獨立與建立東南亞真正和平所進行之鬥爭^⑫。實際上，蘇聯對該地區政策目標是，加速美國勢力從該地區退出，阻止中共與日本勢力進入，進而在亞洲集體安全名義下建立自己的勢力，作為圍堵中共的一環。因此，近年來蘇聯全力擴大與「東南亞國家協會」（ASEAN）的關係，尤其在美國從越南撤退後，蘇聯在東南亞地區的外交活動已大幅加強。現在，蘇聯已與各「東協」國家建立外交關係；並積極從事經濟活動。但是，至今無論在政治或經濟方面，蘇聯在東南亞方面，尚無重大收穫。

註⑩ 例如，馬耶夫斯基（V. Mayevsky），「亞洲集體安全：迫切的問題」，載「真理報」，一九七二年六月二十一日；契赫文斯基（S. Tikhvinsky），「亞洲集體安全：先決條件與原則」，載「世界經濟與國際關係」月刊（莫斯科），一九七四年元月。

註⑪ 柴爾涅謝夫（A. Chernyshev），「太平洋：國際安全與合作問題」，「國際生活」月刊（莫斯科），一九七七年十月，第八十頁。

蘇聯與東南亞地區的貿易未見顯著增加，也未贏得「東協」國家的歡心。部份原因是，東南亞國家經濟體系與蘇聯不同；部份原因是，它們怕引起中共的懷疑。蘇聯最近曾建議與印尼進行經濟合作，在巴塔姆（Batam）島展開聯合錫礦開發計劃，印尼反應不熱心，這個念頭已冷卻下來了。蘇聯也曾大力擴張在馬來西亞的影響力，提議一項水力發電工程計劃，以進行經濟合作。但是，由於該計劃將引進大批蘇聯「技術人員」，同時工程地點又在接近馬泰邊界的敏感地區，因此馬來西亞未曾答應。據悉，蘇聯不久前曾向另一個「東協」國家建議興建一座發電站，但是該國不感興趣。其原因並非由於政治立場，而是由於別國的經驗教訓，唯恐蘇聯一旦中斷合約，將取銷重要零件的供應^②。總之，「東協」國家懷疑共產國家，尤其是蘇聯，對它們擴展貿易與提供援助（含技術人員）的真正動機，均深具戒心。蘇聯與「東協」貿易額有限，但是，蘇聯駐「東協」大使館却經常有大批貿易代表，包括地位極高的人員。無疑的，蘇聯在促進商業與投資外，尚企圖爭取「朋友」、影響人民^③。

在政治方面，蘇俄在東南亞國家領袖的對外政策評估中，影響仍極微小。為確保東南亞政局的穩定，「東協」各國領袖謀求和解除的對象以河內為首要，其次為北平。「東協」各國所以歡迎與蘇聯改善關係，主要目的在制衡中共。因此，蘇聯現今在東南亞的地位僅是一個消極的制衡法碼，而不是其所追求的積極影響力。

對印度，俄國懷有傳統野心。彼德大帝曾為這塊「亞洲的寶石」着迷，列寧則把印度描寫為「東方革命的城堡」並且說「印度是我們的目標」^④。一九四〇年，蘇外交部長對德國外交部長說：「蘇聯領土願望的焦點大抵集中在導向印度洋的蘇聯南方的領土」^⑤。非常明顯，俄國的統治者始終視印度為其向東方及東南亞甚至歐洲擴張的據點。因此，印度在蘇聯的全球戰略中佔有重要地位。目前，蘇聯竭力維持同印度的友好關係，其政策目標為：（一）在匪蘇衝突中發生制衡作用；（二）使印度成為蘇聯建造「亞洲集體安全體系」的主導分子；（三）使印度在世界性的對峙中成爲一個緩衝地帶，甚至成爲蘇聯的盟友。

就蘇聯對整個亞洲的政治活動言，成果并不理想，祇有在阿富汗、伊拉克與印度的情形，是顯著的例外。阿富汗與蘇聯是緊鄰，只有順從蘇聯別無較佳選擇，伊拉克只是地理意義上的亞洲國家。所以，印度是亞洲唯一與蘇聯締結友好條約^⑥的非共產主義國家

註② 羅力 (Anthony Rowley)，「東南亞國家協會對蘇聯的觸角心懷畏懼」，「遠東經濟評論」(香港)，一九七七年九月三十日，第三十九頁。

註③ 同前註，第四十一頁。

註④ 此句出現在托勞揚勞夫斯基 (K. Trojanski) 奉列寧之命所寫之「東方與革命」一文中，譯載倫左夫斯基 (G. Lenczowski)，「俄國與西方在伊朗」(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49)，第十頁。

註⑤ 斯勞托克與拜得耳 (R. J. Sloutag and J. S. Beddle) 編，「納粹蘇聯關係」(Nazi-Soviet Relations) (德國外交部文件，華盛頓，國務院，一九四九年，第二一三頁)。

註⑥ 「蘇印和平、友好與合作條約」，原文載「真理報」，一九七一年八月十日

。蘇共總書記因而於一九七六年初心滿意足地說：「在過去的五年中，蘇印關係有了新的進展。」在評估蘇印友好條約時，他又說，該條約在短期內業已顯示出對雙方關係的重大意義，已成爲南亞以及整個亞洲的穩定性因素。他并特別指出蘇聯在一九七一年印度與巴基斯坦軍事衝突中所發生的「積極」作用^⑤。

儘管蘇聯已成爲印度的武器供應者，儘管蘇聯在印巴戰爭中公然偏向印度，但印度很難成爲蘇聯的真正盟邦。印度的主要政治興趣在於不結盟的第三世界，它也不願自我斷絕非共產世界的外援來源，因而與蘇聯保持一定的距離並且避免作全面性的結盟。也由於這一個緣故，印度政府始終不表示支持蘇聯的「亞洲集體安全體系」的提議。對蘇聯的亞洲安全設計言，印度的贊同具有重大意義。一九七六年中，匪印關係也有了轉機，恢復了互派大使，並舉行了中斷已久的貿易談判。這表示印度在匪蘇間採取有利本國利益的制衡政策。一九七七年三月，印度新政府成立，聲言執行絕對的「不結盟政策」，顯示其與莫斯科的關係已不如舊政府時那麼密切。非常明顯，新政府企圖在蘇聯、中共、與美國之間，維持一個較佳的均衡關係。

蘇聯於協助印度取得南亞次大陸軍事霸權之後，並未取得實質的政治利益。一九七五年孟加拉政變後，該國新領導竭力爭取獨立，與蘇聯及印度關係轉壞；相反的，與巴基斯坦關係却獲改善。這些事件皆令蘇聯失望。至於巴基斯坦，由於蘇聯曾協助印度分裂巴基斯坦，造成孟加拉獨立，很難與蘇聯在短期間改善關係，縱然巴基斯坦與美國及中共的關係並不甚融洽。

蘇聯與亞洲其他共產國家

蘇聯共黨對亞洲共黨政權的控制遠不如對東歐各附庸國的堅強。蘇聯與東歐之間，除有軍事性質的華沙公約組織及經濟性質的經濟互助委員會外，近年來，每逢夏季，東歐各國共黨領袖皆到蘇境克里米亞與蘇共領袖共同「度假」；這些皆有助於蘇聯對東歐共黨國家的控制。在亞洲則沒有任何有形的控制組織。因此，蘇聯亞洲安全構想的目的之一應該是「加深對這些黨的兄弟友誼」。然而，對蘇聯的建議積極響應而作出肯定支持的，祇有僞蒙而已。

蘇聯在越南的地位自從西貢失陷後已見改善，中共地位相對下降，然而，河內並未順服蘇聯，與越戰期間比較，其獨立性高出甚多。

寮國的新領袖雖然比較傾向蘇聯，但是對中共仍舊恭順；顯然，他們在兩大共黨政權間，玩弄制衡手腕。

在高棉，蘇聯的地位，不比其他任何外國勢力優越，且不如中共穩固。

從表面上看，僞蒙古似乎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實際上乃是蘇聯的殖民地。蘇聯在外蒙駐有大量軍隊，這是盡人皆知之

事；而蘇聯在雙方各部會間又實行所謂「直接聯繫」的辦法（例如，蘇經濟部直接與僞蒙經濟部聯繫），對僞蒙加緊控制。因此，僞蒙不僅成了亞洲共產政權中唯一的蘇聯的忠實追隨者，而且也是整個蘇共集團中最忠心的附庸。在匪軍事對峙中，僞蒙成了蘇軍的陸空基地。在亞洲共黨中，也惟有蒙共支持蘇共的「亞洲集體安全體系」構想。

在亞洲共黨中，北韓算是一個大黨，僅次於中共。在蘇共與北韓的關係史中，時有波折。一九五六年北韓共黨的親蘇派曾試圖推翻金日成的統治，未獲成功。六十年代初期，蘇聯與北韓間一直存在着爭論，直至一九六四年赫魯雪夫下台，始告平息。在匪蘇爭執中，北韓保持中立。蘇聯呼籲南北韓和平統一，也不使北韓軍事力量大得足以單獨對南韓發動戰爭。如果北韓一旦發動侵略戰爭，則蘇聯所提倡的亞洲安全構想，將付東流；美蘇和解將難以繼續；日本勢將加速武裝。這些皆對蘇聯全盤的對外政策不利。況且，即使北韓能夠僥倖統一韓國，也非蘇聯之福。因為一個統一的共產韓國可能更加親匪；也可能在匪蘇衝突間兩邊敲詐。可以推斷，一個分裂的韓國比一個由韓共統治的統一韓國對蘇聯更加有利。

結語

儘管中共不承認蘇聯是亞洲國家，但是蘇共自稱，無論就歷史或地理條件言，蘇聯既是歐洲國家也是亞洲國家^②。在這個前提下，它似乎自然有權，也有理由爭奪亞洲主宰地位。當美國勢力在亞洲鼎盛之時，蘇聯無可奈何。六十年代末期，蘇聯羽毛已豐，而美國在亞洲的勢力又有退却傾向，蘇聯於是迫不及待地表白其意願，其所提出的「亞洲集體安全體系」構想，不但是此種意圖的表達，也是達成其目標的工具。

蘇聯欲爭取亞洲霸權，首先必須迫使美國勢力退出亞洲，抵制匪日聯盟、防止中共或日本勢力進入東南亞，維持其在南亞次大陸的優越地位。但其中任何一宗皆非易事。因此，近年來它在亞洲並無顯著進展。然而，不應忽視蘇聯外交行爲的一個特點，那就是對既定目標的專心一志，不達目的不罷休的精神。在進行「亞洲集體安全體系」一事上，蘇聯顯然是採取循序漸進的戰略，不斷努力試圖與個別國家簽訂雙邊或多邊安全條約，然後把這些條約串連起來而形成一個以蘇聯為中心的體系。這一體系一旦形成，中共如果參加，則將處於從屬地位，如果不參加，則將為此一體系所包圍。當然，「亞安體系」能否實現的關鍵不在蘇聯將作出多大努力，而在自由世界將作出多大妥協。

註② 烏特金，「保障亞洲安全之路」，載「國際生活」月刊，一九七七年四月號，第九十一頁。